

# “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笔谈(上)

**摘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性的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本组笔谈即致力于探讨全球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分上下两篇。上篇中,何云波的文章探讨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的选择与出路;李兰生则试图通过对中外文化关键词的清理寻求跨文化阐释的途径;王晓东以《道与逻各斯》和《中国阐释学》两本书为例谈如何寻找中国文论自己的声音;周春通过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小说《所罗门之歌》谈民族身份的失落与认同。

**关键词:** 全球化; 比较文学; 文化关键词; 张隆溪; 莫里森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2-0238-07

## 全球化与比较文学的选择

何云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与我们密切相关、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这一现象正日益影响着我们当代的文学研究。当今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就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文论研究的日益融合。这一趋势与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研究、理论研究热有关。那么,在全球化趋势下,当今比较文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便成了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比较文学的产生,有赖于“人类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而知识全球化和“跨文化生存”,为我们提供了在跨越性的视野中,以全球性的视界去考察本土文学、文化的可能。人作为个体,往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亦然。每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西方15~16世纪的三次大航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都被认为对人类关于“世界”形成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个“世界”是西方意义上的。其实,在哥伦布“发现”之前,那块大陆已经存在,并且有人在那里休养生息。但是这一切,对“世界”来说,似乎是“虚无”的,只有在被西方“发现”之后,它才“存在”,才被赋予“意义”。当哥伦布踏上那块土地,说“这是我的”,这也就意味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开始。西方向东方的殖民扩张,又被看做是一种文明的教化。西方与东

方,一度也就等同于“文明”与“野蛮”,欧洲中心主义由此应运而生。

如果说在赛义德看来,西方看东方,总是跟偏见联系在一起,西方对东方的描述,常常是扭曲性的,无论是理想化还是妖魔化;反过来,中国看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亦不例外。中国者,中心也。这便构成了中心与四夷的对应。而所谓中华,即指居于中心的文化繁盛的地方。当洋人进来,便成了“洋夷”。“英吉利”被写作“英狒狒”,跟洋人有关的事往往都被加上了“虫”“犬”之类的动物性偏旁。洋人入华乃为慕教化而来。西方的“科学”“技术”被当做了中国传统的“术数”“方技”。如此等等,同样体现了中国对西方的“误读”。如何摆脱本土主义立场,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以超越自身文化之外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正是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在西方,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的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些研究大多与消解“中心”有关。解构主义是对西方自身主流“真理”话语的消解。而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一些非主流话语力量,如女权主义、少数民族话语、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逐步聚集起力量,开始了从边缘到中心的“非边缘化”和“消解中心”的运动。在这种趋势下,全球化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

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同时也成了比较文学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与此同时,全球化与本土化,又往往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电脑网络的发展),使得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文化在互相影响下,也有越来越趋同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战以后殖民体系的瓦解、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迫切要求发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因此,全球化实际上并没有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在后现代语境下,“现代性”中的“总体、同一性、中心论”遭到批判,而被代之以“分离、非中心、差异”等后现代话语。在多元文化中如何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民族文化操守等问题便逐渐凸显出来。

“身份危机”与“身份认同”,似乎成了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个人身份危机与现代化相关,它源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的自我失落与异化;女性性别身份危机,乃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产物;而民族身份的问题,则与西方中心主义密切相关。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的结果,而现代化又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当上个世纪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获得民族解放,在选择自己的发展之路时,又命定般地选择了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说,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而所谓的全球化,也就成了“西方化”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无须太多的理论论证,只须看看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不光是物质上,观念上,文化工业的生产上,就连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所操的一整套话语,都是“西方”意义上的。

面对全球化时代日益西化的趋势,民族化、本土化,成了对抗西化的一种策略。如前所述,超越本土主义、文化自我中心主义,需要一种跨越性的、世界性的眼光。但问题是,如果说在20世纪之前,“世界”往往是各区域性的文明的松散结合,而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化,使各区域文明日益被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艺术的“区域性话语”日益被“世界性话语”所取代。而这种“世界性话语”又往往是西方意义上的。正如余虹在《艺术与精神》中所说:“20世纪的‘世界化’事实上就是‘西化’,20世纪的世界性要求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要求。”艺术如此,整个文化亦然。本土主义便构成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

份,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的一种努力。

西方化与本土化,代表了两种文化价值取向:一种是放弃本位立场,自觉认同以外来的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世界文化;一种是坚守本位立场,坚信本土文化的价值必将在世界的潮流中发扬光大。俄罗斯19世纪在面向西方的过程中,出现了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中国“五·四”以来也一直有着西化与民族本位的两种潮流。那么,我们是否能超越这种两元对立的思维,在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找到一条共通之路?

比较文学,就是探讨在各种跨越中(跨国、民族、语言、学科、文化)的文学、文化的沟通与理解的问题。归根到底,它是要寻求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对话。因而,它研究的问题与当今世界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密切相关。我们以《当代世界文化趋势与比较文学》为研究课题,就是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当代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各种文化、文论潮流给比较文学带来的冲击、启示。同时,在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的视野中,寻求一种文化之间的对话。

而对话的前提是话语的相通。话语,往往包括概念范畴、话语规则及文化精神。就“全球化与比较文学”而言,首先面临的就是对“全球化”及与“全球化”有关的概念的清理,如全球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民族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西方、世界、世界文学等,从其产生、译介、接受、变异等方面对其做一个基本梳理。而由一定的概念范畴、言说方式组成的“话语”往往代表着一种知识体系,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比如文明与野蛮、现代化与西化。当诸如全球化、现代性之类的“话语”被频繁使用,且被不同的使用者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而像民族主义、本土主义、部落主义之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法。回到学术研究的起点,对这些概念作一些溯本清源的工作,便成当务之急。

在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出路,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与跨文化对话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作一些探讨。而梳理当代西方文化、文论思潮如诠释学、接受理论、形象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也有利于深化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大家先围绕这些问题作些讨论,具体的研究有待于以后的深入。

(作者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不错,现在应该更加发展它。它已经打开了难以想象的局面,到处少不了它,全球性。我们有力量能做到这一点,很重要。”

莫里森在这里不仅仅道出了黑人文化所面临的美国主流文化的冲击与侵蚀的尴尬处境,也表明了作者勇于承担挽救正在濒临灭绝的黑人文化的坚定决心和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莫里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通过叙说黑人男性奶人的成长经历,描写了在种族制度下的黑人对自己的文明和历史的怀念。这部作品反映了莫里森的一个基本主题:认同祖先、认同民族文化,黑人才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和真正的自由。小说中俯拾皆是民间传说、神话、歌谣及宗教仪式都成为她致力于弘扬和维护的黑人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评论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时,人们往往局限于其民族性、政治性,而忽视其性别因素。事实上,性别与政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莫里森独特的女性视角,恰恰是其他男性作家所无法企及的。作为女性作家,她更为关注的是既处于主流文化边缘又处于男性文化边缘的黑人妇女的命运。因此,女性的成长历程与命运成为莫里森关注的中心。即使在《所罗门之歌》这样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中,女性仍然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奶人从一个父权至上、与黑人祖先和集体疏离的家庭中走出来,到认同祖先、认同集体,其姑妈派拉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派拉特作为民族文化的承载者、黑人文明的继承者,以其博大的胸襟和爱心引导奶人走向黑人群体,认识到“爱”的真谛,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寻回了

自己的身份。这位唱着“甜大哥飞走了”的民谣,与自然紧密相连并且与死去的父亲进行持续不断的灵魂交流的女性,实际上成为黑人文化的代言人,她的博爱、宽容、智慧、自主和自然使得她成了书中真正的灵魂。

作为女性作家,莫里森还有着一般男性作家所缺乏的细腻笔致。她笔下的矛盾冲突也因此比一般男性作家的更为复杂。在她的作品中,不仅描写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多表现的是黑人民族内部不同个人和群体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与斗争。她的小说似乎在暗示我们,像奶人父亲那样完全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与传统文化脱节,固然行不通,但是像吉他那样具有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固步自封的人同样无法适应日益现代化的社会。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既接受主流文化中进步的东西以发展落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又留住本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才是黑人最好的生存状况。作者认为社会真正呼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正是由于缺乏沟通,才造成了奶人与吉他对派拉特的误解,以及最后奶人与吉他之间的互相残杀。同样,个人与个人、男性与女性、民族与民族乃至整个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的也是对他人的文化取向和异质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展开交流与对话,而不是排斥与对抗,这也是全球化社会中所真正呼吁的一种精神。正因为如此,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中的身份认同具有了一种世界的、普遍的意义。她给我们如何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寻求新的文化抉择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作者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global context ( I )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regarded as a trend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ich distinguishes itself as an intercultural literary study in one aspect encounters lots of new issues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 Here are two groups of articles that present an exchange of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group, He Yunbo offers his choices and orientations for the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Li Lansheng finds a way of tran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rough the semantic analys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key words; Wang Xiaodong re-finds the voice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tself by citing as examples; Zhang Longxi's *The Tao and the Logos* and Li Qingliang's *Chinese Hermeneutics*; Zhou Chun analyzes the loss and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self-identit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ading of Toni Morrison's *Song of Solom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key words; Zhang Long-xi; Morrison